

从观念形态到社会结构

——《郊区佛陀》中的阶级表征及其文化意涵

李亚飞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郊区佛陀》书写的历史背景为20世纪70年代,恰逢英国社会文化的深度裂变:流行文化、左翼思潮、青年亚文化等战后文化思潮弥漫彼时的英国社会。当时英国青年群体的观念形态,充盈着反叛精神和激进主义,成为促成英国社会阶级结构颤动的重要推手。此外,盛行其时的左翼思潮极力倡导关注族裔和阶级问题,对弱势群体的生存境况和日常生活充满兴趣,这在客观上为少数族裔底层青年提供了契机,他们借此获得从事左翼剧团表演和玩弄流行音乐的机会,并以此取得对英国社会文化的批判和言说权力,进而在英国文化中开始融入少数族裔的声音和观点。

关键词:《郊区佛陀》;阶级;流行文化;族裔经验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19)05-0055-06

0 引言

英国当代巴基斯坦裔作家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于1990年出版小说《郊区佛陀》,引发了不小轰动,不仅斩获“惠特布雷德”最佳处女作奖,还在国外批评界产生了“无休止的评论”(Driscoll, 2009: 130)。小说书写的历史背景为20世纪70年代,其时恰逢英国社会文化的深刻裂变:流行文化、左翼思潮、青年亚文化等战后社会运动和文化思潮弥漫英国社会。这些社会运动和文化思潮直接催生了激进主义和反叛精神等观念形态,它们充盈了整个英国社会,尤其受到广大青年群体的青睐。由于观念形态的转变,社会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颤动,阶级之间的流动呈现出可能性,这是战后英国社会变迁的一大动向。作为英国第二代少数族裔移民作家的库雷西对此种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有深切的感知和敏锐的洞察,他以文学表征的形式,在《郊区佛陀》中书写了南伦敦郊区底层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和阶级跨越。小说在特殊历史语境下探讨英国社会的阶级问题当然是具有特殊性的,有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值得深入考察。然而,大多批评的观点都只是关注作品中的族裔问题,对其中的阶级问题鲜有涉及。为了进一步拓展对该小说的批评空间,有必要走出“纯粹”的族裔身份分析模式,将阶级问题纳入考察的范畴。

本文尝试以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参照,重点关注作品中的少数族裔青年如何借助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观念形态的结构性变化,凭借自身族裔经验的特殊性来获取阶级的晋升。众所周知,“阶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糜海波,2017: 16)。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实际上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去进行阐发,认为阶级矛盾的根源在于某一特定阶层对生产方式的控制,而另一阶级必须通过交易体力劳动来获得基本生存资源(Day, 2001: 6)。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则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式的关注生产方式的分析方法转向关注阶级意识和阶级文化,强调“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独特的价值体系,认为它是历史运动背后的推动力所在”(陆扬,2007: 135)。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其实现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因素所决定(莫小丽, 2019: 20)。换言之,特定阶级构型的生成并不单单只是受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制约,它的形成过程实际

收稿日期:2019-05-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14ZDB0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亚飞,男,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叙事学和当代英美文学研究。

上更为复杂,所涉及的相关方面也更为多元化。就小说《郊区佛陀》而言,70年代英国的特定历史语境和彼时英国社会的族裔问题都构成形塑当时英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基本成分,它们为促成作品中的少数族裔青年群体实现阶级跨越提供了重要助推力。本文将通过还原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考察小说对于70年代英国社会阶级问题的表征,最终旨在揭示库雷西通过对彼时英国阶级政治的书写所表达的文化意涵。

1 流行文化、反叛精神与70年代的社会观念形态

库雷西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他对流行文化“极其着迷”(Kumar et al., 2001: 124)。从第一部电影《我美丽的洗衣店》(*My Beautiful Laundrette*)到《郊区佛陀》,再到后来的《黑色唱片》(*The Black Album*),都有对流行文化的大量书写。1995年,库雷西更是和音乐记者乔·萨维奇(Jon Savage)合编了一本关于流行音乐的书《费伯流行音乐读物》(*The Faber Book of Pop*)。在书中他提到:“流行音乐是一种呐喊,不是一种书写。它是关于个体的身体感受,不需要过多心智层面的理解,其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智的。”(Kureishi, 1995: xviii-xix)他认为:“从流行乐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历史,流行乐在表达历史方面绝不亚于任何其他形式,因为它杂合了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各种问题,它已经成为战后文化的核心。”(Kureishi, 1995: xix)就库雷西来而言,流行文化是带有重要社会文化内涵的符号,对于流行文化的探讨也构成观察特殊历史语境中的阶级、种族、性别等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郊区佛陀》展现了一幅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文化图景,着重关注了诸如“解放运动,另类生活方式,以及流行文化(尤其是音乐文化)的兴起”(Finney, 2006: 124)。小说中的青年,克里姆、查理、杰米拉都积极拥抱这一时期的流行文化,从思想观念到行为习惯,无一不受其影响。他们对流行文化的狂热和痴迷直接铸就其思想观念中充斥着激进主义和反叛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流行文化,或者说反主流文化渗透到来自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中,尤其是其中的青年群体,对其所持有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性别认同等意识形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塑造和建构作用。然而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通常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时尚,故流行文化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整体社会观念形态的重塑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小说中的主人公克里姆在性取向上呈现出模棱状态,有双性恋的倾向。他不但对同性玩伴查理有爱慕之情,还与他的“青梅竹马”杰米拉保持着性关系。克里姆到了伦敦从事剧院演艺事业之后,不但和来自上流社会的伊琳诺成为恋人,还倾心于其所在剧场的导演马修·派克,并同时和其妻子玛莱娜有过性经历。克里姆混乱的性取向以及他个人的性实践是当时大部分英国青年的一个缩影。克里姆极为反叛和另类的性观念究竟源自哪里?和大多数的英国青年一样,克里姆对摇滚音乐着迷,喜欢绯红国王乐队、软机器乐队、牛心上尉、弗兰克·扎帕、野人渔夫等摇滚乐队或歌手(库雷西, 2016: 84-85)^①。他的阅读兴趣也大多为较为激进的文学作品,如《北回归线》《在路上》、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集。无论是摇滚乐中对于个性的直接表达和对身体感官的颂扬,还是《北回归线》《在路上》等文学作品对于性爱的大胆描写,都无疑对于克里姆个人在性别、性等问题上的理解有直接的塑造作用,这种反叛精神冲击着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

流行文化对于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的塑造作用还体现在,它改变了青年一代对于性别认同的理解和实践。同样出生于南伦敦郊区的第二代印度移民杰米拉为克里姆的儿时玩伴,其思想观念从一开始就受到一系列激进主义文化元素的塑造。小说中,她“从十三岁开始就读个不停,读波德莱尔、科莱特、拉迪盖和她能找到的那些疯狂作家的书”(71)。她在钱袋里放了张女性主义文化学者安吉拉·戴维斯的玉照,将其奉为偶像,克里姆就杰米拉的叛逆行为评论道:“她就想做波伏娃了。”(71)杰米拉的父亲安瓦是一位保守的第一代移民,年轻时候从印度来到英国定居,但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仍然停留在印度社会的观念系统当中,虽然身处英国,但仍然活在他自己想象中的印度。安瓦对其女儿杰米拉进行包办婚姻,并用绝食的方法逼迫她嫁给来自印度孟买的钱格兹,杰米拉虽然屈服于父亲对其婚姻的安排,并最终与钱格

^① 下引此书只注明页码。

兹结为连理,但却从未与钱格兹有任何实质性的夫妻行为。叙述者克里姆对杰米拉评价道:“不管怎么说,我们活在一个反叛时代非常时期,杰米拉对无政府主义者、情势主义者、地下气象员组织分子都很感兴趣,他把所有与这些人相关的材料从报纸上剪下来给我看。在她心目中,嫁给钱格兹成为对反叛的再反叛,此举是一种新颖的创造。”(110-111)在她父亲去世后,她加入了公社生活,成为激进社区的一员,转而成为一名双性恋,同时和公社的西蒙和乔安娜相恋。杰米拉所持的激进的性别观念,以及其操演的性别身份,都具有反传统的意味,这同样源自流行文化对青年日常生活的渗透。

流行文化对于青年群体的观念形态和实践行为的塑造是全国性的,不仅仅局限于伦敦郊区少数族裔青年。这种广泛的影响也是跨阶层的,来自不同阶层的青年似乎在流行文化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当克里姆进入学校,第一次和女同学同班学习,班上的女同学叛逆之极,他“听见她们在谈论以前从不知晓的轻率的东西:打胎、海洛因、西尔维娅·普拉斯、卖淫。这些女的都是中产阶级,但她们脱离了自己的家庭”(126)。这种风靡整个青年群体的激进主义和反叛精神似乎可以模糊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因为来自底层中产阶级的克里姆和杰米拉与其他来自中产阶级的同龄人都持有同样的观念形态。流行文化所倡导的反叛精神也成为底层中产阶级和其他阶层进行对话和交际的一个平台,这将挑战长期以来大多数英国人所持有的阶级固化的观念,无形之中影响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

2 从观念形态到社会结构:文化转型与阶级流动

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节点所出现的某些文化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实际上是和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的演变联系在一起的。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实践和生活方式中的变化必然和社会结构相关,因为艺术品、饰物、唱片、电影和戏剧史在市场上买卖。文化中的变化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是因为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也是因为社会结构本身有所改变。”(贝尔,2012:56)流行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兴起和泛滥实际上也预示着社会结构方面的微妙变化。在小说《郊区佛陀》中,流行文化所传播的激进和反叛思想对阶层与阶层之间固有的区隔形成一种消解和冲击力,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原来存在于不同阶级之间的界限。从这个层面来看,《郊区佛陀》不仅捕捉了70年代英国社会出现的“文化转型”(Head,2002:220),还洞察到了当时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即原来存在于不同阶层之间的区隔开始出现松动,阶级之间的流动开始呈现出可能性。

作品中青年一代的整体观念形态受到流行文化和左翼思潮的塑造,充斥着反叛精神和激进主义,而这打通了阶层之间的交流渠道,使得来自不同阶级背景的个体能够开展社交,模糊了阶层之间的明确界限。流行文化成为来自不同阶级背景的青年可以共享的一个“空间”,成为他们之间相互交际和互动的虚拟场所。故事中的主人公克里姆来自南伦敦郊区的底层中产阶级,他到达伦敦后从事左翼剧团表演工作。其同事伊琳诺出身显赫,来自典型的上流社会背景,其“父亲是美国人,拥有一家银行;她母亲是受人尊敬的英国肖像画家;她有个哥哥是大学教授”(229-230)。然而,和当时众多深受流行文化影响的青年一样,伊琳诺思想激进,是不折不扣的左翼戏剧演员。现实生活中,她接纳“扫大街的,一个极肥极丑,穿防雨服,体重十六石的苏格兰人”希特(232),以实践她所坚持的反叛思想和极端主义。与此同时,克里姆与伊琳诺同为伦敦左翼剧团的同事,二者都是左翼文化的实践者,有共同的文化兴趣。克里姆跨越阶层的束缚,追求伊琳诺,和她成为恋人。流行文化中的激进因素对于阶层之间原有的隔阂形成了一种冲击力,来自不同阶层的青年人在“激进”和“左翼”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能够借此来进行社交互动。可以说,流行文化成为一种连接不同阶层青年人的一个桥梁,这自然对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固有界限和区隔构成了一种挑战。社会阶级内在的规定性逐渐被外部条件所瓦解,即流行文化这种外部条件冲击了原先的家庭门第、出身特权等自然决定因素,成为阶级与阶级之间流动的一个催化剂。

同样来自郊区的查理在音乐上取得巨大成功,成为风靡全国的反主流斗士。查理通过玩弄流行音乐,迎合当时激进思想的潮流,实现阶层的跨越同样能够说明流行文化对于阶级流动的助推作用。和克里姆一样,在郊区时的查理深受流行文化的影响,思想和行为都极为反叛,他“喜欢到处找地方睡觉,他一

无所有,居无定所”,把每天都视为“一场冒险”(157)。小说中的查理发现,当时英国青年的音乐趣味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人们开始钟情于表达愤怒和呐喊的流行音乐。如书中所言,“英国音乐风尚正在急转,从豪华巴洛克转向愤怒的车库”(203)。查理由此加入朋克潮流中,并把自己的乐队名改为“罪人”,称自己为“查理英雄”(同上)。查理的音乐被当时的青年一代视为一种呐喊,受到广泛的欢迎,为此他“被全国性的报纸、杂志、符号学家们没完没了地追逐,他的话被引用,成为新虚无主义、新绝望主义和新音乐的例证”(同上)。查理之所以能够在音乐上取得成功,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这和当时整个英国社会出现的流行文化的泛滥是分不开的,他的音乐形式迎合了当时青年一代对激进主义的向往,其个人也被作为英雄般的反主流文化斗士加以符号化。查理从郊区中产阶级下层的背景出发,通过迎合大众对于流行音乐文化的审美趣味,成为全国青年一代崇拜的对象,实现了阶级的跨越。

如果说70年代流行文化中的激进主义和反叛精神为不同阶层背景的青年群体提供了交际的空间,以此模糊了阶层之间的界限的话,这一时期盛行的左翼思潮及其主张的对于英国族裔和阶级问题的批判则为以克里姆为代表的郊区底层中产阶级实现阶层跨越提供了丰润的滋养力。彼时英国社会所流行的左翼思潮强调对族裔问题和弱势群体的关注,在文化实践上对这类相关问题展开猛烈的社会批判。这为少数族裔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借用个人族裔身份的独特性,迎合这一批判趣味,获得与左翼批判群体为伍的机会和权力。在这一背景之下,小说中的少数族裔底层中产阶级对个人独特族裔经验的挪用也成为促成其阶级流动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来自郊区底层中产阶级的克里姆通过利用其族裔经验和移民社区文化,迎合当时社会对于族裔问题和阶级问题的批判倾向,将其作为他实现阶级晋升的一种策略。

克里姆为第二代印度移民,其父亲是移民英国的印度人,母亲是英国白人。虽然他自称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但他对自己的混杂身份存在焦虑和不安,认为“人们常常觉得我这种英国人挺搞笑的,像是从两个古老历史里冒出来的新品种”(3)。独特的族裔身份使得克里姆在学校受到种族歧视和欺凌。他在学校被人叫“大便脸”和“咖喱脸”,回家时满身口水、鼻涕、粉笔印和木屑,“每天从学校回家身上没有负重伤”(86)他就已经很幸运了。当他和来自上流社会的剧团同事伊琳诺交往时,克里姆试图极力隐藏自己的南伦敦郊区口音,生怕暴露自己属于郊区底层中产阶级的阶级背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于英国社会阶级和族裔问题的批判成为一种流行,克里姆的族裔身份和独特社区经验因此成了他突破阶层障碍跻身伦敦戏剧演艺界的一个关键筹码。戏剧导演沙德维尔让克里姆出演吉卜林《丛林之书》中的莫格利这一角色,因为在他看来,克里姆皮肤黝黑,“瘦小结实”“扮相可爱而健康”“不会显得太色情”(186)。克里姆的表演非常成功,从而受到当红左翼戏剧导演马修·派克的赏识,派克因此要求克里姆加入他的下一部“围绕英国所具有的唯一主题”(218)展开的戏剧,即有关“阶级”的戏剧。克里姆想极力遮蔽和掩盖的族裔和阶级身份却成为其个人演艺事业上的一个资本,他不得不通过贩卖和利用其独特的族裔经验和阶级背景去赢取个人物质和社交关系上的成功。这也是为什么当克里姆拿下派克所导演戏剧的角色后,作为白人中产阶级的鲍伊德对他说:“如果我不是白人和中产阶级,现在我已经是在演派克的戏了。明摆着眼下只靠才能什么事也成不了。眼下这七十年代的英格兰,只有弱势群体才能成功。”(219)

3 反思与批判:库雷西阶级书写的文化意涵

20世纪末期,戴维·卡纳戴恩指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阶级’都是对英国社会结构最为准确的描述”(Day, 2001: 13)。卡纳戴恩所说的“阶级”实际上涵盖了阶级之间的流动。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至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个群体或社会阶层在这样的一种外部条件起主要作用的社会结构中,往往上下浮动,不断地引发社会各群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变动”(王晓路,2012: 168)。20世纪70年代,由于流行文化、左翼思潮等来自大众的批判声音笼罩英国社会,青年群体的观念形态发生着持续的变化,这直接导致英国社会先前所形成的阶级结构和基于这一阶级结构的其他关联模式开始出现颤动和流变,新

的社会结构正在悄然形成。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库雷西的《郊区佛陀》关注到了战后英国的观念形态和整体社会结构正在萌芽和生长的新内涵。

与奈保尔和鲁西迪不同,库雷西是一位出生并生长在英国的少数族裔作家,他并没有殖民地地区的成长和教育经历,然而他作为第二代巴基斯坦裔的族裔身份使其不可避免地携带有殖民地传统的成分,这使得他在作品中对英国社会少数族裔阶级问题的探讨带有独特的视角。库雷西于1954年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第一代移民,而其母亲是一位来自底层中产阶级家庭的英国白人。库雷西对英国少数族裔的阶级问题的探讨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后殖民主义的层面,即不止于分析殖民主义遗产如何影响少数族裔移民的价值观念、文化身份以及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从英国文化特性的角度对“后帝国”时代的英国文化做出整体性的思考,即他能够从英国社会文化内部去反思英国文化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对英国整体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断裂与分崩有敏锐的感知。换言之,库雷西的阶级书写具有移民和本土的双重视角,对战后英国社会和文化的探讨具有一种反思的批判性。

库雷西在《郊区佛陀》中所书写的少数族裔阶级政治实则他本人对后帝国时代英国整体文化景观的一种反思和批判。小说表达了70年代的英国呈现出阶级流动的可能性,流行文化作为一种消解力,冲击了原来存在于阶层之间的隔阂。同时,彼时盛行的左翼思潮倡导对英国的社会文化发起批判,关注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等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境况,这为少数族裔挪用个人独特族裔身份和阶级身份搭建了平台,他们借此加入到批判英国社会文化的群体中。这一方面说明,来自殖民地区域的少数族裔移民可以颠覆被“凝视”和被塑造的殖民系统,并在帝国中心开始他们的生活和实践。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开始从帝国时代英国对少数族裔的“凝视”到后帝国时代二者之间的“对视”。如小说叙述者克里姆所说:“我们追求‘英国玫瑰’就如同我们追求英国;通过得到这些奖品,得到这些亲善和美丽,我们壮起了胆子与帝国及所有的傲气臣民们对视——对视‘毛毛背’的眼睛,对视大丹犬的眼睛。我们变成了英国的一部分……”(301)

另一方面,这也同样说明,这一时期的英国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蜕变。少数族裔能够在流行文化和左翼思潮等助推力量之下,获得个人阶层的跨越和晋升,从而取得加入左翼剧团表演的权力,实现个人在后帝国时代从郊区边缘到城市中心的流动。这种从郊区边缘到城市中心的流动,不仅仅意味着阶级身份的一种变化,更暗示了英国文化内涵从早期单一而同质化的英国性到全新的多元化的英国性转变。正如库雷西曾经所指出:“是英国人,白种英国人,必须学习身为英国人之道不再是以往那一套方式。现在称自己为英国人是一件更复杂的事,牵涉到新的因素。因此必须有一种崭新看待不列颠的方式和必须面临的选择:经过这些时日后,必得有一种身为英国人的新方式。许多想法、讨论和自我检验必须牵涉到考虑这种需求,也就是身为英国人的新方式和什么有关,以及取得这种条件有多困难。”(Kureishi, 2002: 55)克里姆加入左翼剧团,与当时的英国左翼文化知识分子一道,对英国的社会问题提出批判,在过程中将族裔多元性融入英国社会的整体文化图景之中。通过在英国文化中掺杂来自不同族裔背景和不同阶层背景的声音,他们对英国文化的内涵加以“狂欢化”,挑战传统帝国时代英国文化的纯洁性。从这一点来看,《郊区佛陀》也是库雷西对英国文化内涵加以改写和修正的一种尝试。

4 结语

《郊区佛陀》以社会观念形态的变化管窥社会结构的转型,将70年代影响英国社会极为盛行的流行文化和颇有影响的左翼思潮与阶级流动性关联起来,书写了流行文化如何影响英国社会的阶级流动。流行文化作为一种消解阶层之间区隔的冲击力,为来自不同阶层背景和族裔背景的个体提供一个普遍认同领域,进而模糊了阶层之间的界限。与此同时,为迎合当时英国社会所流行的对族裔和阶级问题的批判趣味,边缘少数族裔通过挪用其独特的族裔经验和社区文化,出演戏剧表演中的少数族裔角色,取得和上层左翼知识分子共同开展文化批判活动的权力,进而从边缘郊区走向中心城市,跻身上流文化知识分子圈。他们因此也开始在整个英国文化景观当中融入少数族裔的声音和观点。库雷西试图由此说明,后帝

国时代的英国整体文化内涵正在被族裔的多元性、阶级的流动性及身份的混杂性重新界定,英国文化的整体内涵和所指也在发生变动。

参考文献:

Day, Gary. 2001. *Class: The New Critical Idiom* [M]. London: Routledge.

Driscoll, Lawrence. 2009. *Evading Class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Finney, Brian. 2006. *English Fiction Since 1984: Narrating a Nation*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Head, Dominic. 2002.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Modern British Fiction 1950-200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mar, Amitava, and Hanif Kureishi. 2001. A Bang and a Whimper: A Conversation with Hanif Kureishi [J]. *Transition* (10): 114-131.

Kureishi, Hanif. 2002. *Dreaming and Scheming: Reflections on Writing and Politics* [M]. London: Faber.

Kureishi, Hanif. 1995. That's How Good it Was [G] // Hanif Kureishi and Jon Savage. *The Faber Book of Pop*. London: Faber, xvii-xx.

丹尼尔·贝尔.2012.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严蓓雯,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哈尼夫·库雷西. 2016. 郊区佛陀[M]. 师康,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陆扬. 2007. 文化研究中的阶级轨迹[J]. 社会科学(11): 135-141.

糜海波. 2017.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形成理论[J]. 理论视野 (4): 16-19.

莫小丽. 2019. 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多维度辨析[J]. 湖北社会科学 (2): 20-28.

王晓路. 2012.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Class Representation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in *The Buddha of Suburbia*

LI Yafei

Abstract: *The Buddha of Suburbia* is writt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1970s Britai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British culture was experienc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the whole British society was permeated with postwar cultural thoughts coming from popular culture, left-wing thought, and youth sub-culture. Rebellious spirit and radicalism were extremely popular among British youth, which catalyzed the class mobility in British society. In addition, left-wing thought was in mode during that time, and it cares about ethnic and class issues, showing great interest to the living condition and everyday life of the underprivileged people. This provides the ethnic lower middle class young people with an opportunity, by which they can work in the left-wing cinema. Accordingly, they gain the power to criticize British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 so as to articulate their ethnic voices and viewpoints.

Key words: *The Buddha of Suburbia*; class; popular culture; ethnic experiences

责任编辑:冯革